

印刷傳媒與宋代詠史詩之新變

——以遺民陳普詠史組詩為例

張高評*

〔摘要〕

雕版印刷之崛起，造成印本購求容易，知識傳播便捷，對於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及其他經史哲思，必有所激盪與迴響。宋詩之學唐變唐，自成一家，印本寫本之爭流消長，提供豐富之圖書信息，作為閱讀接受之觸發，對於宋詩特色之生成，宋詩宋調與唐詩唐音之同源異轍，印本繁榮自是其中轉化之關鍵與觸媒。本論文選擇創作歷程較受圖書閱讀、版本流傳諸因素影響之詠史詩，作為論證之視角；時代圈定印本業已取代寫本之宋末元初，詩人則討論理學家陳普，關注其身處閩學薈粹，書院林立，刻書繁榮，藏書豐富之福建地區，講學宗法朱熹「格物致知」一派，以此背景考察其《詠史》組詩362首，作為研究之文本。分詩篇自注、資書以為詩、翻案生新、連章逞巧四方面，舉例闡說；從而可見雕版印刷影響詩歌體制、語言、技法、風格之一斑。文學研究，可以整合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而一之，本文權作嚆矢。

關鍵詞：印本文化、陳普、詠史、組詩、宋詩特色

*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中文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7年9月5日，審查通過日期：2007年11月7日

責任編輯：王國良教授

一、印本文化、圖書流通與宋代詠史詩之嬗變

(一) 宋人作詩之困境與雕版印刷之崛起

知識傳播之媒介，由甲骨而鐘鼎，自簡帛而楮墨，自寫本而印本，愈進而愈簡約輕省，功效數倍於前代。尤其是雕版印刷崛起，作為知識傳媒，相較於漆書竹簡，論功計效，「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

雕版印刷之發明，大概起於盛唐前後，確切時代頗多爭議。據出土文物考證，1974年陝西西安西郊出土唐代刊印梵文經咒，學者以為是世界已知最早之印刷品，較敦煌《金剛經》(868年)早約200年，比日本《陀羅尼經咒》(770年)早百餘年。1944年四川望江樓唐墓出土龍池坊卜家刊本《陀羅尼經咒》，學界以為757年以後刊本。日人藏有吐魯番所出《妙法蓮華經》一卷，當是現存世界最早之印刷品，學界斷為武則天(684-705年)時雕版印刷。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咸通九年(868)《金剛經》印本，風格接近古代血本，雕版技術已非常成熟。¹至五代後唐時，宰相馮道奏請「校正九經，刻版印賣」，從此刻書不限於佛經日曆。政府提倡雕版，監本成為範式；由於刻書印賣有利可圖，於是有官刻本、坊刻本、家刻本，「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印刷出版蔚為流行風尚。發展至南宋，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宋代，可謂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

北宋開國以來，右文崇儒，科舉取士人數快速暴增。以北宋貢舉為例，「平均每年取士人數之多，在科舉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²科舉考試促成書院講學之風潮，影響閱讀接受之行為，助長雕版印刷之繁榮，同時推波助瀾了圖書流通之便捷，引發出知識信息之革命。真宗更下詔勸學，有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之言。蘇轍〈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所謂「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可見知識之神秘力量，與現實之榮顯

¹ 李際華：《佛經版本》，〈早期刻印本佛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1-23；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第一章〈雕版印刷之發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6-26。參考程煥文編：《中國圖書論集》，查啟森：〈介紹有關書史研究之新發現與新觀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8月)，頁57-59。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頁269-270。

²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又，〈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國學研究》第二卷(1994年7月)。

利益。

太宗（976-997）注重訪求圖書，「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補正闕漏，用廣流布」。真宗（998-1022）時，「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學者易得書籍」，「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已見雕版印刷發達之便利。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圖書流通雖以寫本為主，然官方文化機構整理典籍，訪佚校勘，鏤版印行，推廣不遺餘力。靖康之難（1127），監本書版盡為金人劫掠毀棄。高宗紹興年間（1139-1151）下詔重刻經史群書，「監中闕書，次第鏤版」，於是雕版書逐漸成為公家藏書主體。論者指出，南宋為雕版印刷全面發展時期：中央和地方官府、書院、寺觀、私家、書坊，多有刻本。由於監本平準圖書價格，故印本較寫本價廉，書價約為寫本書十分之一而已。³物美價廉之印本圖書，就商品經濟而言，尤其有利可圖。論者稱：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刊刻《小畜集》30卷，每售出一部，即有233%之高利潤。《漢雋》全書凡十卷，每售一部利潤高達70%。圖書出版業既以低成本、高效率獲得利潤；因此能刺激買氣，活絡出版市場。⁴職是之故，宋代雕版數量之多，技藝之高，印本流傳範圍之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⁵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從藏書目錄考察南宋寫本書與刻本書之消長，略云：

後人一致認為《遂初堂書目》著錄了不同的刻本是一特點，並且開創了著錄版本的先例。但尤袤是以抄書著名的，而且在他的時代，刻本書的比量似乎還沒有超過寫本書。而且，《遂初堂書目》內記版本的僅限於九經、正史兩類。由於著錄簡單，連刻本的年月和地點都沒有表現出來。只有到

³ 印本書價與寫本之比，參考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中國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早於歐洲的原因〉（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43；陳植鏗：《北宋文化史述論》，第一章第五節〈教育改革對宋學的推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頁139-141。至於雕版印刷諸刊本的書價，可參考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第十章第四節〈宋代書業貿易之發達〉，「宋代的書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頁434-436；袁逸：〈中國歷代書價考〉，《編輯之友》1993年2期。

⁴ 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宋代的書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頁434-436；袁逸：〈中國歷代書價考〉，《編輯之友》，1993年2期。

⁵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南宋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頁84。

了趙希弁和陳振孫的時代，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他們對於刻本記載方才詳細。當然，尤袤的開始之功是應該肯定的。⁶

晁公武（約 1105-1180）《郡齋讀書志》、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趙希弁（1249 年在世）《郡齋讀書志·附志》、陳振孫（1183-1249）《直齋書錄解題》，為現存南宋四大私家藏書目錄。由四大藏書著錄觀之，南宋前期印本書以經史兩類為主，後期子集兩類急遽增加，集部激增尤著。⁷北宋元祐以來，寫本與印本互有消長，迨尤袤撰《遂初堂書目》時，刻本書之數量尚未超過寫本書；但至趙希弁及陳振孫著錄書目時，刻本書之數量已超過了寫本書。咸淳間（1265-1274），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取校 23 種版本，清一色為印本，無一寫本。從此之後，刻本書籍取代寫本，幾乎壟斷了圖書市場。寫本與印本之消長，影響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這是可以斷言的。

雕版印刷在宋代之繁榮昌盛，提供宋詩學唐變唐之便利和契機，終而自成一派，與唐詩分庭抗禮，平分詩國之秋色。唐詩之輝煌燦爛，誠如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所謂「菁華極盛，體制大備」。因為「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所以，蔣士銓〈辯詩〉感歎「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當年王安石身處北宋詩文革新之際，早已看清「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的困境。⁸面對這種困境，明袁中道從宋人之詩歌創作，得出宋人消極與積極的因應之道，以及解決良方：

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為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自出手眼，各為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於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景窮，而遂無所不收。（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十一，〈宋元詩序〉）

宋人面對唐詩之高峰，消極工夫是「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積極策略是「處窮必變」、「自出手眼，各為機局」。其策略多方，要以追新求變，

⁶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第三章第五節，（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20。

⁷ 同注 5，〈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於四部目錄書的著錄〉，頁 107-110。

⁸ 《陳輔之詩話》引王安石語，《宋詩話輯佚》本，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12 月），頁 90。

自成一家為依歸。宋代詩學之課題，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以故為新、化俗為雅，以及提倡句法、捷法，標榜活法、透脫，體現翻案、白戰、破體、出位諸現象，大抵多以傳承繼往為手段，而以開來拓新為極致，一舉而解決承繼傳統和建立本色之雙重使命。上述每一術語與課題所謂雷同、剽襲、他人殘唾、前人語下、鐵、胎、故、俗，以及相對應之死法、辨體、本位，其參照系統為唐詩，即是促成宋人追新求變，自成一家之古典詩歌本色與典範。有了雕版印刷之繁榮，知識傳播之便捷，詩人隨心所欲閱讀接受大量信息，讀書破萬卷成為可能，自然左右文學的創作風格，以及文學批評之趨向和類型，這應該是合理的推想，當然有待進一步之論證！

（二）雕版印刷、宋詩特色與宋代詠史詩

知識跨越時空，無遠弗屆流傳，大概與書寫之形制，傳播之媒介，圖書之流通，以及商品經濟之繁榮密切相關。從甲骨文、鍾鼎文，經竹簡、帛書，到紙墨寫本，知識傳播已歷經無數進步與飛躍；相形之下，寫本之輕巧便利，實造就唐代文學之輝煌，唐型文化之豪華。⁹五代以後，雕版印刷運用於圖書典籍之刊刻，加上北宋右文崇儒，有心推廣印本，科舉考試、書院講學，佛道說法，作詩習文又皆需求豐富圖書，於是因時乘勢，雕版印刷與古籍整理、圖書流通、知識傳播結合，供需相求，遂形成「印本文化」（又稱「雕版文化」）之繁榮昌盛。

相較於寫本卷軸，雕版圖書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諸優長，於是快速發展，成為知識傳播之新寵。尤其宋版書之殊勝，在內容充實，外觀講究，「書法精妙，鑄工精良，紙質堅潤，墨色如漆，蝶裝黃綾，美觀大方」，前人多所稱道。¹⁰在「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的情形下，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鏤之廣，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是盛況空前的。知識的傳播媒介，從寫本轉為印本，不僅書籍製作速度加快，書籍複本流通數量增多，而且對知識信息之傳播交流，圖書文獻之保存積累，都有革命性之成長。¹¹李約瑟

⁹ 參考程煥文編：《中國圖書論集》，二、簡帛文化；三、寫本文化，頁 62-150。

¹⁰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8月），頁 45；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一章，〈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宋版特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 133。

¹¹ 同註 9，程煥文：〈中國圖書文化的演變及其意義〉，頁 15-16；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張秀民〈南宋刻書地域考〉，頁 196-236。

(Joseph Needham)、卡德(T·F·Carter)等西方學者一致指出：中國印刷術西傳，促使教育平民化；於是促成了中古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資本主義之興起。因此，西諺有云：「印刷術為文明之母」，誠哉斯言！¹²雕版印刷與商品經濟之密切結合，促使宋代文化蔚為華夏文明之登峰造極。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不同，雕版印刷之繁榮，促成知識革命，形成尚理、重智、沈潛、內斂之士風與習性，為其中重要關鍵。

反饋(feedback)，原是電子學術語，原指「被控制的過程對控制機構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足以影響過程和結果。應用在生理學或醫學上，指生理或病理之效應，反過來影響引起效應之原因。¹³美學、文藝學借鏡「反饋」學說，指稱原因和結果由於相互作用，形成反應回路，因而主客易位。印本圖書與文學創作、詩話筆記間，由於審美品味、閱讀接受，和商品經濟關係，亦交相作用，互為因果。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文學之發展，兩者共存共榮，彼此影響，也自然形成一個反饋系統。唐代文學之輝煌燦爛，清代蔣士銓曾感慨「宋人生唐後，開關真難為」。宋人面對此種困境，因應策略，首在汲取古人、尤其是唐人之優長，作為自我生存發展之養料；既以學古學唐為手段，復以變古變唐為轉化，終以自成一家為目的。從學習優長，到變古變唐，到自成一家，每一歷程都牽涉到大量閱讀書籍，方能因積學儲寶，出入古今，而斟酌損益，新變超勝。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文章性理〉稱：「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為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此黃庭堅〈與王觀復書〉其一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蘇軾〈稼說送張琥〉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皆可見讀書貴在精博之意。印本圖書與寫本爭輝，對於讀書精博，胸中萬卷，自有推助促成之功。因此，筆者以為：雕版印刷之崛起與繁榮，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極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詩分唐宋」之

¹² 李約瑟著，范庭育譯：《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二、〈中國科學對世界的影響〉(臺北：帕米爾書店，1987年3月)，頁66。

¹³ 反饋，原是控制論術語，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下，系統把信息輸送出去，又把信息所產生的效應輸送回來，從而影響信息的再輸出。輸出和送回之間，彼此相互作用，這樣的過程叫做「反饋」。說本胡繩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反饋」，(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96-197。美學、文藝學借鏡其說，指稱「不斷地根據效果來調節活動」，形成「反應回路」的意識作用，參考余秋雨：《觀眾心理學》，第三章〈反饋流程〉(臺北：天下文化，2006年1月)，頁67-68。

重要觸媒，是「唐宋詩之爭」公案中之關鍵證人。就宋詩特色之形成來說，其中自有雕版印刷之推波助瀾，圖書流通之交相反饋諸外緣關係在。循是可以想見，宋詩之外，詞、文、賦、四六、文學評論，及其他宋代文學門類，及宋代經學、史學、理學、佛學禪宗、道家道教，標榜會通、集成、新變、代雄者，要皆與雕版印刷之繁榮，圖書之流通有關。北宋以來，印本與藏本寫本並行，圖書信息量必然超越盛唐中晚唐與五代；至南宋末理宗度宗時，印本逐漸取代寫本，對於閱讀接受、學習定向、文學創作與批評理論，甚至文化轉型，多有影響。

古籍整理、雕版印刷、圖書流通、閱讀接受、知識傳播，五者循環無端，交相反饋，形成宋代印本文化之網絡系統。就宋詩追蹤典範，擷取優長，到新變代雄，自成一家之歷程而言，近程目標是學古學唐，表現方式有三：其一，編輯唐人別集；其二，評注唐詩名家；其三，宋人選編唐詩。其次，為閱讀唐詩，撰成詩話筆記，推崇唐詩宗風，分享讀詩心得。於是有所謂唐人之別集、評注、詩選、詩格，皆先後雕印，攸關唐代詩學論述之詩話筆記亦次第刊行，雕版印刷提供宋人閱讀、學習、接受、宗法唐詩之諸多便利途徑。¹⁴宋人作詩之學唐變唐，宋代詩話筆記之提倡學唐變唐，得印本圖書流通之便利，方能功德圓滿，水到渠成。又其次，詩話筆記提倡學唐變唐，藉雕版印刷之流傳，又反饋到詩歌之創作中，詩學中豐厚的信息量，影響到宋詩之語言、風格、意象、主題，和技法。所謂「有所法而後成，有所變而後大」，宋詩以師法唐詩之優長為過程、為手段，以新變代雄、自成一家為終極目標，傳承與開拓一舉完成，在在皆以唐詩為參照系統，此拜雕版印刷之賜，印本購求容易，圖書流通便利，有以致之。同時宋人刊刻現當代詩家別集者多，詩人年譜、詩集評注亦隨之編著；於是又有宋代詩派詩選之編纂，宋人選評宋詩諸總集之雕印。¹⁵宋人之學古變古，學唐變唐，終能超脫本色，而自成一家者，其中若無雕版印刷之觸媒推助，恐難以奏其效而竟其功。

宋詩不同於唐詩者，在廣用詩思出位與破體為文。筆者以為，無論出位或破體，非有豐厚之圖書信息不為功。而崛起宋代之印本文化，改變知識流通的慣性，

¹⁴ 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整理傳世，詳參萬曼：《唐集敘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

¹⁵ 宋人編纂刊刻當代詩文別集、詩歌總集，可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月）；筆者據此，別撰一文，參考本書第六章，宋代詩歌總集別集之刊行與宋詩體派之流行，分二目討論：（一）宋人選宋詩與宋詩體派之形成；（二）宋代詩人別集之鏤版與大家名家之崛起。本論文尚未發表，頁145-164。

可以提供宋詩創作者無盡藏之圖書資源與豐厚之知識信息量。在雕版印刷盛行，印本購求容易；公私藏書豐富多元，閱讀信息量暴增，知識能量無限廣大之南宋文化界，進行文學創作和評論，勢不得不勤於閱讀，妙於飽參。因此，宋代大家名家之詩，多少有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所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之傾向，劉克莊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不止是蘇軾、黃庭堅、江西詩人而已。原因無他，雕版印刷之影響詩壇文壇，甚至經學、史學、思想界，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且無時不在，無遠弗屆也。職是之故，學界討論宋代文學，及其他宋代學術，自不能忽略雕版印刷、印本文化之因緣與激盪。¹⁶

為體現宋代之文化活動實況，學界研究宋代之文學與學術，若能嘗試整合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而一之，則研究視角獨特，成果必定新穎可觀。此中天地，無限遼闊。綜觀詩歌創作之類型中，較受圖書閱讀、版本流傳諸因素影響者，莫如詠史詩與讀書詩；¹⁷今姑以南宋陳普詠史詩作為考察文本，以論證上述觀點。博雅方家，不吝指正。

陳寅恪曾稱：「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試觀宋代史書數量空前增多，官修私撰史家空前輩出，史書體例空前發展，史學範圍空前擴大，以及方志體裁之充實完備，區域史學之普遍繁榮，即不難想像其盛況。¹⁸案諸《宋史·藝文志》及其他公私藏書目錄，如《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三朝國史藝文志》、《兩朝國史藝文志》、《四朝國史藝文志》、《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以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略》等等，皆可見證史學之繁榮。北宋官府藏書數量，約 6705 部，73877 卷；南宋偏安，搜羅亡佚，雕版刊行，藏書亦近六萬卷。宋代刻書業興盛，不僅

¹⁶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收錄所作二文：〈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古籍整理與北宋詠史詩之嬗變——以《史記》楚漢之爭為例〉，嘗試將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與文學作一整合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年 11 月），頁 1-65；頁 149-188。

¹⁷ 張高評：〈北宋讀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24 卷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91-223。

¹⁸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40。參考高國抗：〈宋代史學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 4 集，1983 年；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第十四章〈史學的空前繁榮〉（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 4 月），頁 610-625。

前人著作陸續開雕傳世，以供研讀借鏡；即當代作品亦多印刷成書，因得流傳後世。宋代之版刻，對於書籍之流布，知識之傳播，貢獻極大。王世貞《朝野異聞錄》載：權相嚴嵩被抄家時，發現家藏宋版書 6853 部，可見明代宋版書流傳之一斑。宋版書存世於今者，日本阿部一郎教授考察，全世界約有 2120 種，3230 部以上。由宋代之藏書目錄，明代宋版書之流傳，以及當代海內外宋版書之著錄，可以推想宋代圖書流傳之盛況。¹⁹

在雕版印刷盛行，印本購求容易；公私藏書豐富多元，閱讀信息量暴增，知識能量無限廣大之南宋文化界，進行文學創作和評論，勢不得不勤於閱讀，妙於飽參，方有助於觸發和創造。詠史詩之寫作，必先積儲歷史傳記於胸中，以供取捨剪裁，以資褒貶抑揚。因此，圖書版本之流傳，必然影響創作或評論之內涵與指向。宋代雕版印刷促進圖書流傳、知識革命，誠如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所謂「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於是書肆印本充斥，書多而價廉，提供公私藏書豐富來源。三館（崇文院）與秘閣，為宋代國家館閣藏書機構，他如國子監、御史臺，地方如府、州、郡，亦多有豐富藏書。兩宋私家藏書，動輒數萬卷，北宋如宋敏求、司馬光、李公擇等；南宋如葉夢得、李清照夫婦、陸游、岳珂、晁公武、尤袤、陳振孫、鄭樵、周密、廖瑩中等，多可提供借閱參考。²⁰圖書信息量如此豐富而多元，因此，宋代文士之學養，多如百科全書式之富厚精博，東坡所謂「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雖有待論證，然印本文化與藏書文化交相映發，勢必影響宋代之文學創作、編著，及評論，甚至其他經、史、哲、思，這是可以斷言的。

所謂「詠史詩」，泛指登古蹟、思古人、讀古史、說古事，關涉興亡得失、裨益勸懲經世者多屬之。弔古、覽古、懷古、讀史詩，皆涵概在內，此就詠史之廣義言之。自東漢班固首作〈詠史〉，其後支派流行，綿延不絕。以筆者考察，詠史詩之源流，類型大抵有四：其一，櫟括史傳，不出己意，以班固〈詠史〉為代表；

¹⁹ 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第十一章〈宋代的刻書與藏書〉，二、版本的流傳，（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485-487。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宋代版刻述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頁 21。

²⁰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王鐸點校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8、26、32、40、44、51、53、65、73、75、79。徐凌志主編：《中國歷代藏書史》，第四章第二節（宋遼金時期）〈私家藏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165-192。

其二，以史爲詠，唱歎有情，以杜牧李商隱所作爲代表；其三，借古諷今，托史寄意，以左思〈詠史〉，李清照〈夏日絕句〉爲代表；其四，別生眼目，創意超勝，²¹則爲宋代詩人所專擅。前三種類型，爲六朝四唐所精工，且源遠流長，蔚爲詠史詩之基本模式。至於體現「未經人道，別具隻眼」之卓絕史識，則專屬宋代詠史詩之創發與本色。其中之流變與從違，大概與雕版印刷之發達，圖書流通之快捷，寫本與印本之消長爭輝有關。筆者推想，宋代史學之昌盛，對詠史詩之創作自有促進激盪之作用。

詠史詩以櫟括本事爲下，以別出心裁爲上；猶讀書之於作詩，宜講究「書爲詩用，不爲詩累」，以消納書卷爲上，賣弄學問爲下。在史籍刊行，圖書信息得來容易而多元情況下，詠史詩所追求者，當較他體爲有創意，較難能可貴者。宋代詩學標榜「不經人道，古所未有」，南宋詠史詩尤其盡心致力於此，陳普《詠史》組詩 362 首有具體而微之體現。

二、圖書傳播與陳普詠史詩體製之特色

陳普（1244-1315），字尙德，號懼齋，福州寧德人。宋亡，不仕。隱居授徒，學者稱石堂先生。著有《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全宋詩》第六十九冊卷 3645-3651 錄存其詩七卷，其中《詠史》組詩見於卷 3650、卷 3651 之中。《宋元學案》卷六十四潛庵學案，列爲韓翼甫（恂齋）門人，論者稱：「石堂之學實本輔氏，輔氏之學出於考亭，真知實踐，崇雅黜浮」；又謂：「今誦先生之集，得深養厚，粹乎溫如，的然程朱正脈」，²²則其理學宗仰，昭然可知。試觀《全宋詩》載存所作〈朱文公〉、〈程朱之學〉四首、〈文公書厨〉、〈大學〉、〈中庸〉五首、〈論語〉十四首，以及〈孟子〉一〇五首諸作，²³可知其論學旂向，大抵歸屬程朱理學一派。論者指出：建陽刻書大族與朱熹閩學關係密切，邵武軍、南劍州官刻本、家刻本

²¹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第五章〈書法史筆與北宋史家詠史詩〉（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頁194-214。

²² 宋陳普《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明閔文振編，傳鈔明嘉靖丙申（十五年）寧德縣刊本，明陳裒序、明程世鵬書後，國家圖書館藏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一，頁649、頁651。

²³ 分見《全宋詩》卷3646，頁43730-43734；卷3649，頁43774-4378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與建陽刻書相得益彰，福建書院林立促成刻書業之繁榮，閩北莆田私家藏書崢嶸輩出，既消費購書又產出著述；這些外緣條件，都跟福建（尤其是閩北）成爲官刻本、坊刻本的刻書中心有關。陳普身處其間，著書立說，閱讀詠史自然深受影響。²⁴

陳普籍里、居所，以及講學書院，皆不出福建地區。朱熹講學福建，其〈嘉禾縣學藏書記〉曾云：「建陽板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建陽縣與建安縣，爲福建刻書中心，亦爲宋代出版業重鎮。福建刻本號稱閩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陽麻沙鎮所出，爲麻沙本，數量尤多，唯品質較不精。據學界考述，南宋建安建陽兩縣之書坊，有姓名可考者即有三十三家之多。²⁵其中，崇安劉珙在豫章郡齋刻胡安國《春秋傳》、延平葉筠刊刻葉夢得《春秋傳》、黃善夫、蔡夢弼各刊《史記》，蔡琪、劉之問、劉元起皆雕印《漢書》、劉仲立印行《前後漢書》，魏仲立刊刻《唐書》，建本精刊《資治通鑑》、建陽刊本《兩漢會要》、李大異刊刻《皇朝大詔令》、建陽刻本《唐鑑》、南劍州州學刻本《唐史論斷》，泉州郡齋刻本《資治通鑑綱目》、鄭性之刊刻《宋九朝編年備要》、邵武刻本《伊洛淵源錄》、勤有堂刻印《古列女傳》、建陽刻本《宋名臣言行錄》、永福縣學刻本《宋宰輔編年錄》等等，²⁶都是福建刊刻之史部典籍。其他，福州刊刻佛藏道藏，影響深遠；泉州、漳州、邵武亦皆有書坊刊行典籍。論者稱：宋代刻書，北宋初年以蜀刻爲最盛；北宋後期，浙刻最爲精美；南宋時代，則閩刻數量高居全國之首。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宋坊刻書之盛〉稱：宋代出版營利書籍之書商，數福建首屈一指；私宅家塾之出版品，福建仍居甚多。²⁷由此觀之，福建雕版印刷繁榮，學者對於印本購求，圖書流通，自有客觀環境之優勢。朱熹講學福建，門人廖謙曾云：「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

²⁴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第三章〈宋代建陽刻書業的繁榮〉（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1月），頁32-44。

²⁵ 同上註，頁53-111。

²⁶ 方彥壽：《福建古書之最》，〈福建刻印的古書之最〉，列舉福建最早之刻本書，經史子集四部古書凡80餘種，「知名的刻書家和書堂最多」，列舉30多家書坊刻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4月），頁1-245。

²⁷ 同注9，張秀民：〈南宋刻書地域考〉，頁232-235。參考註19，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頁485-486。

庸》、《大學》、《語》、《孟》之說」，²⁸《四書》在當時之廣為傳誦，自是拜受雕版印刷流傳便捷之推助。日本清水茂教授的研究，注意到印刷術的普及，對宋代學術的影響：福建遠離中原，地處邊陲，宋代卻學者輩出、人才如林，甚至成為道學重鎮——閩學之發祥地；其原因「應該和福建出版業的興盛，有重要關聯」。²⁹陳普之學術傳承，詠史組詩於體製內涵之表現，與福建地區出版業之興盛自有關係。

再就私家藏書而言，與雕版印刷之繁榮亦有關連。南宋私家藏書之地域分布，福建二十二家位居第三，僅次於浙江四十三家、江西二十七家。³⁰自北宋藏書家黃晞（建安人）、黃伯思（邵武人）、方漸（莆田人）、吳與（漳浦人）、吳秘（建甌人）以來，南宋福建藏書家以鄭樵（莆田人）、鄭寅（莆田人）、廖瑩中（邵武人）最有名。³¹就福建之地域關係推論，上述私家藏書，陳普極有機會涉獵閱讀，是否因地利之便，善加利用？待考。何況，陳普論學宗程朱「道問學」一路，「尊德性」之餘，較推重知識學問：宗學問思辨之訓，思辨總以學問為礎石；行格物致知之教，致知實為格物之終極目標。³²更何況寫作詠史詩，或櫟括本事，不出己意；或以史為詠，藉唱歎寫神理；或攪碎古今鉅細，入其神會；或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在在與豐富之圖書資訊，便捷之知識傳播，息息相關。

《全宋詩》卷 3650、3651 存錄陳普〈詠史〉組詩 362 首，未有標題。今翻檢國家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明閔文振編《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跋語略云：「先生詠史之作題曰《詩斷》，信乎推心窮迹，昭道比義，繩以《春秋》之法，歸諸天理之公，其詞嚴，其論正，其指深，其意遠，視古今諸家詠史大有間矣。謂詩之斷，不亦然乎？」³³今《全宋詩》所錄〈詠史〉二卷，是否即是閔氏所謂《詩

²⁸ 黎靖德編纂：《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六，〈朱子十三·訓門人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8月），頁2793。

²⁹ 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0月），頁95-98。

³⁰ 袁同禮：〈宋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2期；又，周少川：《藏書與文化》，第三章第三節〈私家藏書在其他地域的分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頁189-191。

³¹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王鏊、伏亞鵬點校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

³² 參考明楊應詔：《閩南道學源流》卷十六，明嘉靖四十三年刊本；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四十，《四庫珍本二集》。

³³ 同註22，頁650。

斷》？待考。陳普身處閩學會粹、書院林立、刻書繁榮、藏書豐富之福建地區，時逢寫本與印本爭輝，印本逐漸取代寫本之晚宋，講學宗法朱熹「問學致知」一派，據此寫作詠史詩，於是體制、語言、技巧、風格，與唐詩或北宋詩相較，遂有許多轉折與嬗變。約而言之，有兩大端：其一，就體制言，分詩篇自注、連章逞巧；其二，就技巧言，分資書以爲詩，翻案生新。以下分兩大段加以論述：

（一）詩篇自注

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及筆削之功所不及者，於是別出「自注」之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史注〉篇，謂其例發自《史記·太史公自敘》，指出「自注」之效用，可以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讀者經由「自注」文字，作者「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³⁴今學術論著之注釋本之。考文學作品之自注，則起於謝靈運〈山居賦〉，辭賦正文 3915 字，而注文 4932 字，注文多於正文，有相得益彰之效用。後世文章之「自注」，蓋以此爲嚆矢。

案諸詠史之作，貴在史識別裁；何況印本繁榮、圖書豐富之南宋，詠史詩追求「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³⁵更注重史識別裁之體現，於是詩人「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有賴詩篇自注之表述。考察陳普所作《詠史》組詩 362 首，詩篇自注幾佔九成，殆是版本大備，「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的特定時空情境，促使陳普詠史詩之體制作如此之轉折與新變。試觀陳普二卷之《詠史》組詩，出於詩篇自注者，或以明述作之本旨，或以見去取之從來，其例實多。陳普所作詠史詩，不脫程朱理學「以文明道」習氣。朱熹之文道觀主張：「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既標榜重道輕文，又認爲文道一體，³⁶陳普以理學家而作詠史詩，顯然受其影響，故《詠史》組詩中之自注，「明述作之本旨」者最多，如：

天生瞽瞍非無意，帝降娥皇更有心。萬點歷山烟雨泪，後來化作幾曾參。

自注：「不瞽瞍不足以教萬世父子，不象不足以教萬世兄弟，不美里、陳

³⁴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注〉（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9月），頁153-154。

³⁵ 南宋費昶：《梁谿漫志》卷七，〈詩人詠史〉，《四庫全書》本，第八六四冊（臺北：商務印書館），頁738。

³⁶ 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三章第二節〈朱熹的文道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頁109-116。

蔡不足以教萬世處窮達，不顏回不足以教萬世處生死，不伯夷、叔齊不足以立天地之常經，不伊、周、泰伯不足以盡古今之通義。凡此數項大節目，若天所為。」（《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有虞氏〉，頁四三七九〇）性習由來繫正邪，古今誰不道蓬麻？無人說與吹簫相，竇薄淮劉本一家。自注：「淮南厲王之死，薄昭之誅，吳太子之死，吳楚之亂，梁武王之驕恣，淮南王、衡山王之叛，戾太子之稱兵，皆以無良師傅與任使姦人同國而然。周勃、灌嬰懲呂氏，選有節行者傳之，竇廣國弟兄遂為賢戚。燕王旦求人宿衛，武帝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然則性習邪正之說，漢之君臣非獨賈生知之也。使當時能充其說，先之天子太子，而概之貴戚諸侯王，漢其三代矣。明於此而暗於彼，得之一家而失之天下，可謂猷之不遠矣。」（《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文帝五首〉其二，頁四三八〇〇）

甫出車延玉座傾，黃金無復贖娉婷。騷人更望胡人返，不識松楸拱渭陵。自注：「王昭君詩人模寫多矣，大率述其嫁胡之悲哀，而未及詳當時之事也。暇日看史，見其本末，猶有可言。妄得數首，句法不能及前輩，聊備其未備云耳。」（《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王昭君五首〉其五，頁四三八〇九）

龍虎鸞雛總可人，當陽傾蓋便蘭金。荊州尺寸都相付，始是當年子敬心。自注：「……由此觀之，魯肅之心，愛玄德君臣，而欲其有成也久也。羽恨孫權不讓，每加無禮。而肅常撫之，豈非愛雲長之才，抱公瑾之負，故然乎。不幸子敬死，呂蒙繼之，遂為曹氏圖羽。羽死，而玄德遂失荊州，漢之大勢去而曹氏之計成。然則肅遲數年不死，則羽不亡，非獨劉氏之福，曹氏成否未可知也。……此事前輩皆未之考。」（《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魯肅〉，頁四三八二六）

陳普〈有虞氏〉詩之旨趣，讀其自注而益明，蓋父子兄弟之教，窮達生死之道，以及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皆理學中人念茲在茲之課題，陳普詠史自不能忘情，故藉詩明道如此。陳普詠史，頗提性習邪正，以論道德事功，如〈文帝五首〉其二，泛舉文帝朝之死誅、叛亂、驕恣、稱兵，皆以「無良師傅與任使姦人同國使然」，無異一篇史論。自東晉石崇〈王明君〉，歌詠昭君出塞，「述其嫁胡之悲哀」，歷代模寫不絕，流傳至今者，大抵六朝詩 14 首，《全唐詩》題詠 67 首；《全宋詩》

所收，北宋 45 首，南宋 96 首詩，共 222 首；³⁷確實皆「未及詳當時之事」，陳普「暇日看史，見其本末」，發現其中「猶有可言」，於是作〈王昭君五首〉，「聊備其未備云爾」，這種遺妍之開發，又是另類的「述作本旨」。陳普 360 餘首《詠史》組詩之自注，篇幅最大，字數最多，達 860 餘言者，首推〈魯肅〉一首，以資書為詩之語言，詩篇自注之體制，遂行其「格物致知」之史論提出。篇末強調：「此事前輩皆未之考」，從可見其述作之旨趣。

綜觀《詠史》二卷之自注，其內容指涉，大要歸於「明述作之本旨」。蓋詩人隱約其辭，詠史又往往意在言外，別有懷抱，陳普詠史安排詩篇自注，於是詩心妙旨，褒貶筆削，讀者即器求道，遂呼之欲出。詠史組詩之主題思想，如鑑戒六朝、會通史論、史識獨到、《春秋》書法、經世資鑑；以理學入詩，藉詩篇自注，標榜道德事功、正誼明道；闡發天理綱常、心術本領，甚至實踐格物致知，詠史詩中固已體現，然參看自注文字，益加相得益彰。擬另撰一文論述，暫不詳說。

詩篇自注，除「明述作之本旨」外，又同時可以「見去取之從來」；詩人「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乃至於史識之高下，匠心之工拙，詩篇得自注之提示與表述，亦不難考察。陳普詠史，大凡翻案生新則自注，資書為詩則自注，會通史論則自注，格物致知則自注，辨證疑似、微言妙旨則自注，亦擬於他篇開展論證。今略舉數例，以明《詠史》組詩之體式。詠史有翻案生新、資書以為詩之例者，如：

詩書禮樂敢忘欽，自是而翁力不任。莫把溺冠輕議論，要觀過魯太牢心。
自注：「高帝所溺冠，皆腐儒也；所嫚罵，皆不才也。洛陽陸賈、酈生，趣一時之利，皆腐儒耳。張良則不嫚矣，其取用糾合，不過以就一時之功，不謂人才止於是也。張良畫八難，皆武王之事，則自謂不能叔孫制禮，使度己所能行為之。此皆知有向上層之事，但自以平生放蕩，氣習已成，不可鞭策。帝王之得天下，己非所敢比擬；帝王之禮樂，亦非己之所能故就其下以聽命。此高帝之實心，不以告人，惟張良默會之耳。」（《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漢高帝八首〉其二，頁四三七九五）

曹操亡年德劇衰，孫權晚節亂如絲。豫州幸自無頗辟，亦為區區怒費詩。

³⁷ 筆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王昭君形象之流變與唐宋詩之異同》（NSC88-2411-H-006-004），附錄一、二、五、六，頁 101-110，頁 116-134。

自注：「建安十八年，操立為魏公，殺皇后伏氏。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以讒殺尚書崔琰，收毛玠付獄，丁儀用事，譖出何夔諸人，群下側目。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與金祿共起兵討之，不克，死。二十四年，為趙雲所敗，失漢中，殺楊脩；關羽收襄陽，殺于禁、龐德，操流涕議遷都避之。二十五年卒。後主建興七年，孫權稱帝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以水洒群臣。八年，發兵浮海求夷亶二洲，亡卒十八。九年，徙虞翻於蒼桐，遣使之遼東求馬，為人所俘。十一年，遣使將兵賫珍寶拜公孫淵為燕王，斬其使，獻首於魏。時年六十。夏，自將攻新城，為蒲龐所敗。十二年，自伐魏，無功。延熙元年，呂壹作威福，伏誅，遣人告諸大將。四年，伐魏無功，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愛霸與和無異，是儀數諫不聽。八年，全公主、楊竺、全寄譖太子及其母王夫人，夫人憂死，太子寵日衰。陸遜切諫，權不悅。遜甥顧譚諫，徙交州。遜被責，憤恚卒。太子傅吳瓘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怒殺之。十三年，廢和，殺霸，殺將軍朱據，族誅陳正、陳象，杖尚書屈晃一百，立子亮為太子，母潘氏為皇后。十五年，復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四月卒。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秋自立為漢中王。辛丑年，蜀中傳獻帝被害，群下共勸上尊號。費詩諫勿稱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蜀先主一十二首〉其十二，頁四三八二〇）

〈漢高帝八首〉其二，就高祖溺儒冠、辱儒生事作翻案，謂「所溺冠，皆腐儒也，所嫚罵，皆不才也」，此一觀點，前人未道，經陳普拈出論證，頗見特識。〈蜀先主十二首〉其十二，自注剪裁歷史，編年紀事，據事直書，不諱不飾，以詠歎先主劉備，舉曹操、孫權作反襯，以大醇小疵論斷劉備，先揚後抑，稱其「幸自無頗辟」，卻為區區進諫而遷「怒費詩」。自注不殫其煩，引述史傳，編年繫事，原原本本，信而有徵。自注文字精博如此，詳備如此，若無豐富圖書，何所據而言然？

就史書雕版刊行而言，北宋以來景祐刊《三史》、監本《十七史》；南宋以來，兩淮江東轉運刊《三史》、眉山刊《七史》、江浙刊《南北朝七史》；南宋中期，建安刊《十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唐書》、《五代史記》）；其他，就地緣關係論，建陽書坊尚刊刻《春秋傳》、《兩漢會要》、《唐鑑》、《唐史論斷》、《伊洛淵源錄》、《資治通鑑綱目》。即如

《資治通鑑》之雕版，由後人所輯宋槧百衲本觀之，宋代最少流傳有七種版本。³⁸若非身處書院林立、閩學薈粹之福建地區，促成雕版印刷繁榮，建安刊刻史書流傳，購求容易，流通便利，陳普《詠史》自注，何所取材，以之援引經典、以之據事類義、以之摭拾鴻采？何能資書以為詩，令讀者即器求道，以得「法外傳心」之秘？印本文化對文學創作之激盪，文學作品之體制與形式因此而有轉折，亦由此可見一斑。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稱：「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持以論陳普詠史組詩，良然。

（二）連章逞巧

組詩，或稱連章之作，始於《詩經》，其後代自有作者。指詩人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不同層次，針對同一主題，創作兩首以上之詩篇；組詩間有內容之統攝性，各章又有相對之獨立性。如六朝阮籍詠懷、左思詠史等，代有佳篇。郭曾炘《讀杜札記》稱：「連章律詩，創始於少陵」；七律連章，更是杜甫所獨創。³⁹筆者以為，連章之作注重多層次、多側面之敘寫，葉嘉瑩先生所謂「自一本發為萬殊，又復總萬殊歸於一本」；⁴⁰可為炫學逞巧、挑戰典範、追求創發，揮灑才情者，提供一競技場與演藝臺。連章組詩藝術結構之多樣化與靈活性，頗為處窮必變，追新求奇之宋人所喜愛。連章組詩，昉於《詩經》，形成於六朝，繁榮於唐代，而稱雄於杜甫；發展至宋代，可謂「自古有之，於宋最烈」。試翻檢《全宋詩》，一題二首以上之詩，所在多有，可以知之。

「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這是兩宋詩人普遍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宋人覺悟到處窮必變，於是以學古變古為手段，從事閱讀、接受、添增、改換，或翻轉變異，或精益求精，於是創前未有，而自成一家。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六論宋詩，所謂「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這種求

³⁸ 日本尾崎康著，陳捷譯：《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7月）。

³⁹ 郭曾炘：《讀杜札記》，〈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炘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頁34；參考馬承五：〈試論杜甫七律組詩的連章法〉，《草堂》1985年2期。

⁴⁰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章法及大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頁49。

異思維、創造性思考，⁴¹是宋人企圖跳脫唐詩典範的因應策略，猶齊天大聖孫悟空企圖跳脫如來佛之手掌心一般。宋詩大家名家如此，詠史詩標榜別識心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尤其如此。

陳普生當宋末元初，浸淫於刻本琳瑯滿目，藏書豐富多元之福建，又身當印本繁榮，逐漸取代寫本之氛圍中。詩人沈思翰藻之際，前人名篇妙句往往紛至沓來，如何避免雷同因襲，而有所創新發明？寫作詠史詩是一大挑戰，創作連章組詩更是因難見巧，展現才學的一種嘗試。考察陳普《詠史》組詩，一組三首者 10 題，一組四首者 12 題，五首者 6 題，七首 1 題，八首、十首各 2 題，一組十二首者 1 題，共 34 題 162 首，佔陳普《詠史》組詩 360 餘首幾近二分之一。若一組二首之詩凡 31 題，亦計在內，則比重超過二分之一以上。觀陳普《詠史》詩之自注，知詠史必不能「但敘事而不出己意」作櫟括，因為印本圖書購求容易，史傳昭然，書卷俱在，無勞鈔錄。若夫以史為詠，唱歎有情；以古諷今，托史寄意，則已讓六朝四唐詩人專美於前，宋人及陳普苟不欲俯仰隨人，恰可因印本文化之優勢，發揮創意造語，留心於「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逞才出巧，以求超勝。今觀陳普《詠史》組詩，頗力行實踐程朱理學「格物致知」工夫，以寫作其《詠史》組詩，故多刻抉入裡，未經人道之語。

陳普連章組詩一組三首者凡十題，分別題詠李斯、韓信、張釋之、董仲舒、魏相、蔡邕、袁紹、晉武帝、羊祜、五王等人。如詠〈韓信〉組詩：

良日登壇計策行，酸醎甘苦共盃羹。不須握手師陳豨，脩武高眠已合烹。
自注：「登壇之日，君臣之位已定。雖時禮義未明，然項羽以弑逆亡，高帝以縞素興。韓信目之，則三綱不明，死有餘罪，尚何言哉？」（《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韓信三首〉其一，頁四三七九八）

群龍共帝牧羊兒，縞素能開四百基。崩徹亦生天地裏，欲將口舌奪民彝。
自注：「高帝、韓信之君臣，與義帝、沛公、項羽之君臣，其輕重厚薄為何如。信與高帝，若子之於父，手足之於頭目也。高帝知人見事無所失，信能以臣道事之，則金匱玉室，與漢終始矣。崩徹反覆深切，而終不行，則天命人心已可見。惜乎其不能深思而疾改也。」（《全宋詩》卷三六五〇，

⁴¹ 張高評：〈創造思維與宋詩特色——以創造性模仿、求異思維為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7年6月），頁217-229。

陳普〈韓信三首〉其二，頁四三七九八)

蹠血中原不用驕，論功何似禹乘橈。始終兩漢無留葛，誰與塵編慰寂寥。
自注：「高明深厚，則為禹之不矜伐；淺薄無學，則為信之矜功負德。古今人品度量之相絕如此，蓋亦不思不學而已。」（《全宋詩》卷三六五〇，
陳普〈韓信三首〉其三，頁四三七九八)

陳普《詠史》組詩，喜談天命綱常、道德事功，而歸本於大一統意識，其妙處誠所謂「自一本發為萬殊，又復總萬殊歸於一本」。如第一首，論斷韓信之身死族滅，以為「脩武高眠已合烹」，無須等到「握手師陳豨」時。陳普以為：劉、韓既為君臣，韓信自當為王馳驅，解救漢王滎陽之圍，豈可高眠脩武，無視君王之危急？故自注稱：「三綱不明，死有餘罪」。筆者研究《史記·淮陰侯列傳》發現：歷代詠韓信之見殺，追本溯源，多以為「胎禍於躡足附耳，露疑於奪符襲車」，⁴²再加上差伍絳灌，自信伐功，在在都是危機死門。以「脩武高眠已合烹」斷定韓信敗症，姑不論其當否，至少是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第二首，持高帝角度立論，以為韓信與高帝，「若子之於父，手足之於頭目」的君臣厚重關係，剷徹不當三番兩次「欲將口舌奪民彝」，違背「天地人心」，而勸導韓信背叛劉邦，自立為王。這些論斷，為漢王朝之一統辯護，不見得正確可取，但卻有其特別可觀處。第三首詩，批評韓信功蓋天下，卻「矜功負德」，徒留遺憾在兩漢，千古英雄「誰與慰寂寥」？此一視角，多與人同，論點不出《史記》「太史公曰」，了無新意，可見創發求異之難能可貴。

陳普聯章組詩一組四首者十二題，分別題詠豫讓、張良、張湯、公孫弘、關羽、荀彧、曹丕、明帝、張華、王導、慕容恪、劉裕等人，如〈張良四首〉：

乳口搖牙向白蛇，一朝電拂博浪沙。下邳不得編書讀，帷幄何妨佐漢家。
（《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張良四首〉其一，頁四三七九七）
撩亂龍蛇掌上爭，罷來閒掉四先生。一棚兒女皆烟散，留得松風萬古清。
（《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張良四首〉其二，頁四三七九七）
本是山東忠孝門，卯金社稷暫相煩。君王良會青雲意，長樂鐘中無一言。

⁴²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十二〈淮陰侯列傳〉，「斬之長樂鐘室」附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6月），頁1263-1264。

（《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張良四首〉其三，頁四三七九八）

太公行輩赤松流，伍叔孫通了不羞。好謝君王深體識，不將身後累留侯。
 自注：「子房素志已畢而不去者，遇合之情有不忍也。漢廷群臣，本非其伍，而子房無所不可。故高帝擊黥布時，與叔孫通共傳太子，且處其下。然則韓信羞與噲伍，小人之量也。子房卒於惠帝六年，漢事尚堪付託。呂后萬歲之間，高帝歷舉數人，而不及子房。蓋知子房素志，生前遇合聊可相從，身後之事不足以辱之矣。」（《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張良四首〉其四，頁四三七九八）

張良佐漢定天下，事蹟詳見《史記·留侯世家》及其他相關紀傳。陳普所作詠史組詩，四章分詠四意，次第分劃，釐然可見；交相發明，分殊總歸一本。拆分組合，有其獨立靈活性，又不失交相映發之統一性。〈張良四首〉，開展多層次、多面向之敘寫，頗富連章之妙。第一首詩，翻案逞巧，以為張良運籌帷幄，足以佐漢家定天下，不在研讀下邳杞上老人所授《太公兵法》。第二首詩，推崇張良為太子存廢事獻策，迎致商山四皓，終得息爭安劉，其節操有如「松風萬古清」。第三首詩，針對漢高誅除異己，斬殺韓信於長樂鍾室，張良竟「無一言」之表述，枉費「本是忠孝門」，「良會青雲意」！微言刺譏，多見於言外。第四首詩，贊揚張良能屈伸、知進退，和光同塵，確為道流人傑。高帝所以「不將身後累留侯」者，蓋「知子房素志，生前遇合聊可相從，身後之事不足以辱之」，設身處地，擬言代言，凸顯君臣遇合之良難。一組四詩，多采多姿，變化盡致。要之，從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面揮灑，具有分離獨立與綜合統一之雙重效應。又如〈項羽〉五首，羅列於下，以便參照：

齊王元在籍軍中，萬馬朱幘照海紅。垓下相逢搵掩袂，更何面目見江東。
 自注：「齊王，謂韓信。垓下之戰，信自將三十萬與羽對，斬首八萬。強顏使武涉往說，復不見從，益可羞矣。羽垓下相對，極力一戰，猶能却信兵。及信再進，遂不可支吾而大敗，平生未嘗有此衄也。其夜悲歌，曲調氣萎，而明日死。」（《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項羽〉其一，頁四三七九六）

試手襄城意未怡，赤城稍覺味如飴。必亡定死終無救，斷自朱殷海岱時。
 自注：「高洋不殺人，則無以為樂，項羽資性殆似之。襄城無遺類，初起

之一快也。方咸陽得志之日，已自為天下伯王時也矣。區區婦人之仁，稍出以留天下心可也，乃復滅青齊，何哉？其為天下，皆棄不予，蓋決於此時，不但以弑義帝也。沐猴而冠，可謂一言之蔽之矣。」（《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項羽〉其二，頁四三七九六）

牧羊義帝實妨賢，猶有三綱共畏天。樹楚擊秦宜奮發，惡名何事苦爭先。
自注：「羽不知顧忌，於環視不敢下手之中而勇猛為之，故不義惟項氏為最。東萊呂氏曰：『項羽弑義帝，是為高帝做了不好事。』」（《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項羽〉其三，頁四三七九七）

倚強恃力却誣天，一樣人心萬萬年。廣武十條逃得過，烏江政自不須船。
自注：「漢楚劉項之際，所謂君臣，皆一時瓦合，非有根株磐石之固。智力相乘，惟利是務，視信義無復有也。能一朝推戴之則為君，叛殺之即為賊；一言為約，守之則為義，背之則為不義。至其末也，存亡起滅，亦往往而由之。可見禮義之心極亂不能忘，而天地鬼神之照臨無時不在也。」（《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項羽〉其四，頁四三七九七）

梟性狼心亦有常，青齊仍復似咸陽。遺黎到處無餘類，欲為何人作霸王？
（《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項羽〉其五，頁四三七九七）

項羽事蹟，詳見《史記》〈項羽本紀〉及〈高祖本紀〉、〈淮陰侯列傳〉諸傳記中。陳普所詠，以五詩分詠五事，各有側重，各有層面：第一首詩，截取垓下之戰一場景，將昔日軍中同僚，翻成今日敵對主帥，特提「更何面目見江東」一句，義蘊深婉，暗諷項羽不能知人善任，自取其敗。第二首詩，直斥項羽殘暴不仁，嗜殺成性，所以走向「必亡定死終無救」之悲劇。項羽負約不信、矯殺擅劫、暴掠殺降、詐阮陰弑，其悲劇性格，已大失天下之心，導致不可救藥，此王安石〈烏江亭〉詠史詩意，⁴³而追本究源，史事歷歷，較荆公詩形象生動。第三首詩，抨擊項羽放逐義帝而弑之，惡名爭先，不義為最。義帝為天下「樹秦擊楚」之精神領袖，項羽私心欲稱帝，以為「妨賢」而弑之。以下犯上，做出錯誤示範，卻又怨恨王侯畔己，而自立為王。陳普詠史指責項羽「惡名何事苦爭先？」可謂絕妙反諷。第四首詩，剪裁〈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史意，謂項羽「倚強恃力」，專逞

⁴³ 王安石：〈烏江亭〉：「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

武勇，「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導致身卒國亡。至死不悟，竟自信「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高祖本紀〉敘漢王數說項羽十罪，所謂「廣武十條」；其反覆責備者，大抵在「信義」二字。陳普作假設翻案謂：如果項羽恪守禮義信約，能得天下擁戴之心，將不復存在烏江渡船之事。詠史特提「廣武十條」，所謂擒賊擒王，能得關鍵。第五首詩重申第二首詩旨趣，反復唱歎，批判項羽梟性狼心，所到靡有劫遺。既然「遺黎到處無餘類」，如此經營天下，試問：「欲爲何人作霸王」乎？〈項羽本紀〉載外黃小兒言：「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可謂一語成讖，與本詩參看，有助解讀。結合三篇史傳，剪裁若干史事，纂組成章，既富多樣性與靈活性，又不失獨立性與統一性，所謂「自一本發爲萬殊，又復總萬殊歸於一本」，此組詩逞巧出奇處。又如〈謝安十首〉組詩，列舉其中五首：

地陷天傾不廢棋，謝安阮籍好同時。江東殘局危亡勢，似太元初尚可為。
自注：「魏晉風俗，以樗蒲弈棋寓遺落世事之意，宰相不廢棋，非小過也。孝武亦中主，天下事尚可為。惟安石負盛名，而以宴游導君，此中原所以絕望，晉室所以遂衰而不復起也。清談之俗，至謝安遂不可救，中原之望，至謝安遂絕。晉至謝安遂淪胥以亡，讀史不可不知也。」（《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一，頁四三八四〇）

軍中如意揮諸將，依約東山嘯詠兄。不遣君王湛酒色，市朝猶足肆王甥。
自注：「謝萬身為元戎，笑詠自高，忽蔑諸將，以致傾敗，父兄之教也。王國寶搆亂朝廷，蓋乘孝武與琅琊王道子嗜酒狎邪而入。使安石能清其君心，去其左右讒諂，國寶即搆亂，尸之市朝可也；不能，則正言以去亦可也。遊談之俗，付之悠悠，亂朝敗國，卒成大禍，迹其馴致，有自來矣。」（《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二，頁四三八四〇）

封胡羯末皎琳琅，歲久渾無憶洛陽。江左家居照江水，謝安元為宋齊梁。
自注：「安石欲作新宮，王彪之固執不從，猶有志存興復之士。彪之死，遂作之，則見其遂安於江左，而無復中原之念，苟於其身，而不為後來之慮矣。孝武信重浮屠，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安石執政之八年也。其後窮奢極費，姘姆僧尼交通請謁，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無所不至矣。」（《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六，頁四三八四一）

諸賢一一是環球，一入清談即鬼幽。何但簡文如惠帝，冶城安石亦斯流。

自注：「清談之人，雖有高下，裁作此樣聲氣，面目便是。管轄所謂鬼幽、鬼躁。鬼者，去陽入陰，渾無生氣，雖生而已為死人也；幽者，晦昧黑暗，不可復明之謂；躁者，利欲之心實急於中，外似靜而中實急也。二者大體皆以去陽入陰，故皆曰鬼也。竹林七賢何晏、夏侯玄、王衍、殷浩、王濛、謝萬、簡文帝，悉是此樣人。謝安亦不免焉，冶城數語，與居喪不廢絲竹是也。」（《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九，頁四三八四一）

夷甫登朝日月昏，爭知安石亦深源。當時赤子何無祿，直自高曾誤到孫。

自注：「王衍、殷浩誤蒼生，安石亦不免焉。」（《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十，頁四三八四二）

謝安（320-385）號稱「江左風流宰相」，事蹟詳見《晉書·謝安傳》、《資治通鑑》，以及《世說新語》諸篇中。⁴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伐晉，謝安運籌帷幄，指揮謝玄等贏取淝水之戰大捷，人服其識鑑與沈靜。陳普題詠謝安，大抵就清談誤國，謝安相業終愧古人發論，組詩十首，每首一意，所謂「一本發為萬殊，又復總萬殊歸於一本」，即指此等。第一首詩，強調謝安位居相國時，雖地陷天傾，殘局勢危，然天下事尚有可為。歎惜安石負盛名，而以清談隨風，宴游導君，遂斷絕中原之仰望。第二首詩，推究清談嘯詠，嗜酒狎邪，為亂朝敗國之所自；諷刺謝安身為輔弼，未能清君心、去讒諂。第六首詩，貶責謝安宴安江左，無復中原之念；苟且其身，不為後來之慮，形象表述東晉偏安之士人心態。第九首詩，抨擊清談陷溺人材，促使「琅球」淪為「鬼幽」，賢君良相渾無生氣，晦昧不明，不只簡文帝不免，謝安亦墮入斯流。呂祖謙〈晉論〉所謂「賢者以游談自逸，愚者以放誕為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⁴⁵可以

⁴⁴ 謝安之瀟灑風流，參考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第四章第三節，一、追求寧靜的精神天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頁294-299。北宋官刻本有《晉書》、《資治通鑑》，南宋則有江浙刊《南北朝七史》，福州建安刊本《晉書》、建陽精刊本《資治通鑑》六種。至於《世說新語》，流傳最早之刻本有三，皆為南宋刻本：其一，日本尊經閣叢刊影印高宗紹興八年董荼刻本；其二，孝宗淳熙十五年陸游刻本；其三，清初徐乾學傳是樓所藏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上述史書諸本流傳是否影響詠史？待考。不過，作為詠史素材之閱讀圖書豐富，得之容易如此。

⁴⁵ 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第二章第一節〈清談思想的歷代評價〉（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頁26-38。

互參。自王衍(256-311)、殷浩(?-356)祖尚浮虛，遺誤蒼生，至謝安(320-385)棋酒消磨、遺落世事，清談玄風流行百餘年，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位居三公之王衍，雅稱「江左風流宰相」之謝安，不能不任其責。此第十首詩所以感慨蒼生不幸，所謂「當時赤子何無祿，直自高曾誤到孫」也！其他五詩，亦皆一詩一意，大抵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發揮求異思維，評述謝安其人其事。陳普〈謝安十首〉之觀點，大抵參酌西晉裴頠(267-300)之「崇有論」，針對魏晉玄學「口稱玄虛，時俗放蕩」之「貴無論」，進行批判與非議；⁴⁶理學家如陳普，史學家如司馬光，於此頗有共識。就陳普詠謝安組詩而言，能自鑄偉詞，發揮別識心裁者多；其創意造語，多不同流俗與定論，頗富宋學「六經注我」之精神。其詠史之體式，為詩篇隨後綴以自注，兩者交相映發，往往相得益彰，其中自有印本流傳，圖書傳播之烙印在。

由此觀之，連章組詩，最當探其用意關鍵。於史傳之蓋棺論定處，名篇之精彩絕倫處，苟知避同趨異，追生求新，進而翻轉變換，別闢蹊徑，則斯篇可與古人比肩爭勝。苟無新意，不必撰作，此固詠史組詩自我期許之規準，亦雕版印刷、印本文化影響下，詠史連章宜有之期待、轉折與拓展。

三、圖書傳播與陳普詠史詩技法之體現

(一) 資書以為詩

自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作詩宗法杜甫，遵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創作策略，於是蘇軾標榜博觀厚積，儲其材用；黃庭堅鼓吹讀書精博，猶「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江西詩學主張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以故為新、飽餐、活法，所謂出入眾作、遍考諸家，何一不是百慮一致、殊途同功於讀書博學？⁴⁷尤其江西詩人作詩論詩，強調「無一字無來處」，故使事用典，已開啓以學問為詩、資書以為詩之風習。

⁴⁶ 裴頠：〈崇有論〉，對魏晉玄學「貴無」思想，有較明確之批判，參考許抗生等：《魏晉玄學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第四章第二節〈裴頠的「崇有論」思想〉，頁279-293。

⁴⁷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唐——博觀約取與宋刊唐詩選集〉，《成大中文學報》第十六期（2007年4月），頁10-14。參考本書第四章第二節，（一）讀書博學與宋詩之新變自得。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稱：「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費袞《梁谿漫志》卷七，亦謂：「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善哉斯言！清崔旭《念堂詩話》引朱彝尊詩稱：「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書卷與學問，對詩歌創作之利病，「資書以爲詩」與「文人之詩」評價之高低，「以議論爲詩」與「以才學爲詩」之優劣，自《滄浪詩話》以至清代宗唐宗宋詩話，學界頗多爭議。⁴⁸筆者發現，雕版印刷之繁榮發達，印本圖書購求之價廉容易；公私藏書之豐富多元，士子借閱接受圖書之便利，此一文化界之客觀事實，一直未被學界關注。苟知南宋印本購求容易，藏本借閱便利，圖書流通無遠弗屆，蔚爲知識之爆炸與革命，於是可悟以議論爲詩、以學問爲詩、資書以爲詩，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實爲宋型文化具體而微之反映。

今翻檢《全宋詩》陳普《詠史》卷上、卷下，詩篇自注者十之九；自注，每多剪裁史料，排比事蹟作爲佐證。蓋詠史詩針對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歌詠，歷史傳記文獻爲其載體。無論櫟括史傳、以史爲詠，託史寄意，甚或別生眼目，雖或不即史、不黏傳，然亦不離、不脫史傳，故詩篇自注中往往繁稱博引，轉相印證，一則信而有徵，再則可收相得益彰之效。如下列諸詩所示，非有印本刊行，豐富圖書作左券觸發，恐難撰成此種類型之詠史詩，如：

漢高禮義入陵夷，械到蕭何更有誰？惟有子房雲外客，不稱名字冠當時。
自注：「蕭何爲漢功臣第一，信不虛。高帝之智，固不但以關中給餉饋而已。帝往往疑之者，見其材雄，恐其有異心也。特以無高風爽氣，無深服帝之心者。」（《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蕭張二首〉其一，頁四三七九七）

少年賈誼空多口，老大申公繆一行。曾識當年二君子，閉門不受叔孫生。
自注：「高帝以倨肆無禮取天下，風氣以成，子孫不能易。故高帝曰：『度吾所能行。』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皆不害所謂自知者也。賈生、申公誠不知時務也矣。賈生為人大抵躁率飄忽，

⁴⁸ 參考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6月），頁83-158；〈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4年3月），頁87-122。

不知樂天知命、操心養氣之學，故一不得志，則悲愁、怨嘆發於言詞，感致異物。梁王墜馬死，誼至愧恨哭泣而死。是於聖賢君子之學，悉未嘗有聞也。」（《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兩生〉，頁四三七九九）

〈蕭張二首〉其一之自注，實櫟括《史記·蕭相國世家》旨趣，作為詠史中之觸媒。詩以不稱名字之雲外客張良，反襯漢高械繫蕭何之隱曲，詩篇並未和盤托出；而是經由自注點醒：「特以無高風爽氣，無深服帝之心者」，詩篇與自注相輔相成，無中生有之詠史本旨乃顯。〈兩生〉詩，詠賈誼申公，斥賈「空多口」，譏申「繆一行」，再憑空杜撰叔孫通「閉門不受」之情事，詩趣隱而不彰，鬱而不發。陳普詠史，蓋依據《史記》〈賈誼列傳〉、〈儒林列傳〉，論斷賈、申二生「誠不知時務也矣」；又據〈屈賈列傳〉傳意，特筆批判賈誼「聖賢君子之學，悉未嘗有聞」，試參照本詩自注，則詩趣昭然若揭。如此作詩，真袁枚《續詩品·博習》所謂：「萬卷山積，一篇吟成」，是劉克莊〈跋何謙詩〉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的「文人之詩」，其佳妙者往往「書為詩用，不為詩累」，此正宋調不同於唐音，文人之詩殊異於風人之詩處，⁴⁹於晚宋理學詩人陳普《詠史》組詩多所呈現。又如：

出嫁氈裘得幾時，昭陽柘館貯歌兒。蛾眉莫怨毛延壽，好怨陳湯斬郅支。
自注：「元帝好德，不留心女色，故昭君隱掖庭不得見。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即位，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卒廢許后、班姬，寵趙飛燕姊妹，以絕繼嗣，成王氏之篡。飛燕本公主家歌者，帝見而悅之。昭君之嫁單于，則以陳湯、甘延壽斬郅支單于，呼韓邪心懼來朝，願婿漢自親，而以昭君予之。正月來朝，二月到胡庭，五月而元帝崩，其薄命蓋在於此。機關樞紐之所發，以陳湯、甘延壽之故也。原按：以上詩三首，多有重句，然意各有寓，故不敢芟除。」（《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王昭君五首〉其三，頁四三八〇八）

呼韓骨冷復雕陶，夜夜穹廬朔月高。為問琵琶絃底話，得無一語訴腥臊？
自注：「昭君嫁單于，呼韓邪已老，三年而死。生一男，曰伊屠知車斯。舊闕氏子雕陶莫臬立，為復株纍若鞮單于，復納昭君，生二女，曰須卜居

⁴⁹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第二編第四章第二節，二、詩非小技呈「本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頁344-347。

次、當于居次。」(《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王昭君五首〉其四，頁四三八〇九)

陳普〈王昭君五首〉，其三與其四，論點別出心裁，獨具隻眼，讀者細心閱讀詩篇之自注，即器求道，法外傳心可得。自注文字，大抵櫟括《漢書》卷九〈元帝紀〉、卷七十〈陳湯傳〉、卷九十四〈匈奴傳〉，《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南匈奴傳〉之本事，再附會《西京雜記》部分情節，有如是豐實之史料文獻佐助，遂便於「以史為詠，正當於唱歎寫神理」。筆者以為，以書卷入詩不為大病，顧運用、消納、轉化何如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不云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無塵俗氣；讀書多，則知得失取舍，方能去陳、出新、自得、入妙。黃庭堅稱：「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閱讀書卷有益於作詩，其間當無疑義。再如：

荆楚留連似失時，涪城歡飲類狐疑。軍中劉曄誇言語，豈識英雄為義遲。
自注：「陶謙死、不敢受徐州；用孔文舉、陳元龍之言而復受。劉琮降曹操，不以告；荀彧勸攻琮，而顧劉表託孤之義，不忍取之，將其眾去。操軍迫近，荆楚士從之如雲，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或勸宜速行取江陵，而以人心依依不忍舍去，日行十里，幾至危殆。法正東來，勸取劉璋，疑而未決，用龐士元之言而後行。既至涪城，劉璋來會；張松、法正、士元勸於會間取璋，可坐得益州，不從其言，與璋歡飲百餘日，彼此無疑。在葭萌，士元、元龍陳三策，以徑襲成都為上，誘執關頭為次，還退白帝城連引荊州徐還圖之為下；不得已，從其中計。凡此，皆劉曄之所謂遲。然聞司馬徽、徐度之言，詣隆中，片語斷金，若決江河，謂之遲不可也。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敏耳。郭嘉謂袁紹遲而多疑，當矣。劉曄謂玄德有度而遲，不知玄德者也。」(《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蜀先主一十二首〉其六，頁四三八一九)

濮陽火裏又潼關，幾度鯨牙虎口間。銅雀臺前閑極目，驚魂猶繞白狼山。
自注：「諸葛《出師表》曰：『曹操智計殊絕人，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桓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曹操七首〉其四，頁四三八二四)

〈蜀先主十二首〉其六，排比劉備「荆楚留連」、「涪城歡飲」二場景，拈出「似失時」、「類狐疑」話頭，駁斥劉曄「玄德有度而遲」之誇言，辨正為「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敏耳」。詠史之徒空空言，往往說服無方，於是詩篇自注，備列考證，援引《三國志·蜀志》傳記，枚舉陶謙死亡、劉琮降曹操、法正東來、誘執關頭諸事件，昭昭明明，不殫煩瑣，要在信而有徵。以學問為詩材，此文人之詩，自蘇軾、黃庭堅倡導，江西詩人附和發皇，蔚為宋詩之本色、宋調之宗風。宋型文化理性、知性、沈潛、內斂、反思、會通諸特質，詠史詩多所體現。〈曹操七首〉其四，仿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李白〈峨眉山月歌〉詩風，連下四個歷史場景之地名，令人有實臨之感受；再加以以鯨牙、虎口、極目、驚魂諸形象語言，曹操之倉惶困頓遂狀溢目前。自注摘錄諸葛亮〈後出師表〉原文，詩境或就困、險、危、逼、敗、死諸字作櫟括生發而成。陳普《詠史》組詩之「資書以為詩」，大抵類此。

鍾嶸《詩品·序》稱：「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又謂：「吟詠性情，何貴用事？」此受魏晉南北朝才性論影響，而有此說，其流極乃有《滄浪詩話》「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之說。然嚴羽立即作一轉語：「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考察古典詩歌之發展與流變，實有直尋性情與補假用事兩大類型，於是有如酒、如荔枝、如牡丹、如三彩陶之唐詩本色，又有似茶、似橄欖、似梅菊、似青花瓷之宋詩風格。⁵⁰吾人篤信錢鍾書「詩分唐宋」之說，⁵¹方有可能論衡「唐宋詩之爭」的歧見。此中一大關鍵，即是「補假」之利病得失如何？考諸前賢論斷，多有持平之見，如云：

古人不朽之作，類多率爾造極，不可攀躋，鍾仲偉有「吟詠性情，何貴用事」之語；嚴滄浪亦言：「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此專為《三百篇》及漢魏言之則可，若我輩生古人之後，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敢曰不學而能乎？且詩兼賦、比、興，必熟通於往古來今之故，上下四方之迹，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又敢曰何貴用事乎？……蓋鍾、嚴所言，專以性靈說詩，未為過也。乃言性靈，而必以不

⁵⁰ 參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第一章第二節〈唐宋詩殊異論與宋詩的價值〉，頁4-10。

⁵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一、〈詩分唐宋〉，頁1-5。

用事、不關學為說，則非矣。……然則以學古用事為詩，則性靈自具；以不關學、不用事為詩，雖有性靈，蓋亦罕矣。（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二十）

夫語由直尋，不貴用事，無可訾議也。然何以能直尋，而不窮於所往？則推見至隱故也。何以能推見至隱？則關學故也。故滄浪又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極其至。」故言非一端已也。「有別才」云云，言其始事；「多讀書」云云，其終事也。守記室之說，一人傳作不越一二篇，傳誦不越一二句，漢高〈大風〉之作，斛律金〈勅勒〉之歌，豈不橫絕古今？請益問更端，則謝不敏矣。（清陳衍《鍾嶸詩品平議》卷中）⁵²

「古今勝語，皆由直尋」；「吟詠情性，何貴用事」，《詩品》此一命題，確為六朝文風之反應。唐詩唐音固然傳承此一本色，然開拓宋詩宋調特色之杜甫韓愈，卻非盡然如此。即號稱最富盛唐氣象之李白，詩風亦不盡然「直尋」，不過「補假」之作而「天然去雕飾」罷了。筆者以為：古今勝語，或由直尋，或緣補假，顧所用何如耳。前文引錄梁章鉅、陳衍之說，折衷兩端，可以息爭。梁章鉅稱：作詩重直尋，不貴用事，「專為《三百篇》及漢魏言之則可」，「我輩生古人之後」，典型在夙昔，「其敢曰不學而能乎？」此言甚得理實。宋人生唐後，面對唐詩之輝煌燦爛，其典範優長豈可視而不見、迴避不學？尤其在宋代雕版印刷繁榮，圖書流通便捷，勢不能不博覽飽參，積學以待用。陳衍之說謂：若作詩直尋，不窮究既往，是由於能推見至隱；能推見至隱，則亦關乎問學讀書。職是之故，宋末元初之陳普寫作《詠史》組詩，體制上出現詩篇自注、資書為詩、翻案生新、連章逞巧諸轉折，與他朝詩人之詠史詩頗不相同，其中自有印本文化之效應在。

（二）翻案生新

翻案，原為法律術語，本指推翻既已定讞之罪案。宋人借用禪宗公案說法，作為文學創作論，引申而有解黏去縛、絕處逢生、推陳出新、反常合道之意蘊。此種翻案手法，普遍存在於宋詩與宋文之中，為不甘凡近，追新求奇，營造文學之密度與張力者，提供靈丹妙方，其效應可以化臭腐為神奇，賦古典以新貌。南

⁵² 引自張伯偉：《鍾嶸詩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外篇，二、《詩品·序》集評，頁234-235。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載錄「誠齋翻案法」，卷七「反其意而用之」、卷八「不沿襲」，可知已由創作經驗提煉為創作理論。⁵³翻案之法，為宋代詩學之重要課題，或由老吏舞文啓發文章翻駁，或由禪思影響詩思而來，此乃宋人之奇特解會。且看下列三則文獻：

禪學盛而至於唐，南北宗分。北宗以樹以鏡譬心，而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為詩者，皆祖此意，謂之翻案法。（元方回《桐江集》卷一，〈名僧詩話序〉）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個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個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清徐曾《而庵詩話》，《清詩話》本，四一則）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馬嵬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有工拙耳。最後一人（鄭畋〈馬嵬坡〉）乃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評文〉）

禪家的機鋒轉語，翻進一層；與宋詩翻案注重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舊意新一層，奇一層說，⁵⁴其間頗多相通相融之處。禪家教人自我作主，教人自得，不可俯仰隨人，肯定「自性自足」、「自成佛道」之自力精神；宋人作詩要求一筆掃盡從未陳腐俗套，切忌隨人作計，期許自成一家。由此言之，禪家的轉語，對宋詩的翻案，自有啓發。董其昌評文則以為，文章家翻案受老吏舞文翻駁啓發，詩文能妙於翻案者，則可以「翻盡從來窠臼」，而有「光景日新」之成效，故文家詩人長優為之。

詠史詩之寫作，最注重史識，最標榜別識心裁。南宋費昶《梁谿漫志》卷七所謂「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者，最為難能可貴。不過，別識心裁，獨具

⁵³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3月），上篇〈宋代翻案詩之傳承與開拓〉，頁13-16。

⁵⁴ 借用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六，第一〇則，「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條，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本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12月），頁230。

隻眼，又談何容易？清代女詩人席佩蘭〈論詩絕句〉有云：「清思自覺出新裁，又被前人道過來。卻便借他翻轉說，居然生面別能開」；⁵⁵宋代詠史詩妙用翻案，早窺此秘。試考察陳普《詠史》組詩，即可瞭然：

長平霜骨白皚皚，廉藺羞顏似濕灰。白起殺心如未謝，二家隨壁獻章臺。
自注：「長平喪師時，廉藺皆在。」（《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廉頗藺相如〉，頁四三七九三）

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亂世姦雄還自嘆，景升直與本初謀。
自注：「謀討呂布，則懼袁紹亂其北，馬騰、韓遂擾其西；遂討呂布，則慮劉表、張繡乘其後；欲征劉備，則懼袁紹襲許；欲擊烏桓，則懼劉備教劉表乘之。使袁紹、劉表有孫策、劉備之略，操雖智，豈能遂吞群雄？惟二人不才，荀彧、郭嘉、荀攸見其肺腑，使操行險僥倖，而無所不成，豈非倖哉？」（《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曹操七首〉其二，頁四三八二—三）

《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載：長平之戰（B.C.260），趙括紙上談兵，軍敗身死，秦將白起坑殺趙軍四十五萬人。陳普〈廉頗藺相如〉詩自注稱：「長平喪師時，廉藺皆在」，讀書可謂得間。詠史或由此生發，進而作假設性翻案，謂長平之戰，喪師辱國，廉頗藺相如身為大將上卿未嘗共赴國難，理當「羞顏似濕灰」。假設秦將白起當年「殺心未謝」，廉藺二人必定身家不保。「隨壁獻章臺」云云，無中生有，形象生動，與杜牧〈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有異曲同工之妙。實則長平之戰時，「藺相如病篤」，「廉頗免」，未嘗有二家獻秦情事。陳普假設白起殺心未謝，遂推衍出許多情節來，將無作有，創意無限。〈曹操七首〉其二，一二句「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活繪出曹操多疑慮之個性特質。⁵⁶三四句再從疑懼生發，作主客之翻案。據自注：本是曹操疑慮袁

⁵⁵ 清孫原湘：《天真閣詩集》後附席佩蘭：《長真閣詩集》卷四，〈論詩絕句四首〉其四。

⁵⁶ 相傳曹操性多疑，懼死後遭人挖掘，故造七十二疑冢，在漳河上。南宋范成大使金詩，有〈七十二冢〉：「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宋俞應符亦有題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評文〉第43則：「曹孟德疑冢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疑冢七十二』，已自翻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於是，七十二冢必無真骨。』此又翻也。」（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紹劉表等擾亂乘襲，卻妙脫谿徑，主客易位，從對面設想，說成「景升直與本初謀」，似乎劉表袁紹業早已串通共謀，要聯合起來擾亂曹操的統一大業，疑慮妄想，形象妙肖，活繪曹操善疑本性。文意一經翻轉，遂遠濫調近境，無俗態凡響。陳普《詠史》組詩，出於假設式翻案者，尚有下列諸詩，如：

亂離揀得一枝棲，得路爭知却是迷。曹操若逢諸葛亮，暮年當作漢征西。
自注：「曹操作西園校尉及屯酸棗時，其所志願未必不正，如後來之云云也。遭值世亂，才長功大，遂為奸人。然其不殺劉備、脂習、禰衡，畏也；不殺徐翕、毛暉，厚待陳宮母子，關羽亡去不追，義也。陳琳辱其兄，張繡殺其子，袁紹、呂布諸將皆仇敵，棄瑕收用，無所留難。知人聽言，務本節儉，思孔融而召之，及被其戲侮，十有餘年而後殺之。使文若始見即以道義輔之，以文若之才略，足使操征伐四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則以操之英決，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逆亂之心老死不發矣。」（《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荀彧〉其一，頁四三八二四）

河岱諸人無一賢，鄆城戰格與雲連。雲長翼德如文若，玄德翱翔早十年。
自注：「關羽、張飛，勇而不智，劉備失徐州，亦羽飛二人不能守。使二人在下邳，如文若在鄆城，使備不失徐，如操不失兗，則事未可知。要之，曹操初興，隨得荀彧、程昱、臧祇、董昭輩，皆智士；玄德創業，僅有羽飛趙雲二三勇士。及操已成天下，無措手處，始得孔明龐法諸公，所以不同。或曰：呂布襲下邳，出於不料；操擣下邳，乘其未集也。曰：使荀彧與呂布同處，豈肯信而不虞，操襲下邳，方有袁紹之憂，不能久也。使文若、孔明守下邳，其却之有餘矣。」（《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荀彧〉其四，頁四三八二五）

苻氏無良妄自尊，鮮卑羌豎正鯨吞。到頭棋酒消磨晉，莫道桓冲果失言。
自注：「淮淝之事，古今共偉。研幾之士猶有可言，謝石、謝琰，謂之不經事少年可也。謝玄破秦之後，展轉衰謝，而以為弘毅任重之才，亦未然。使苻堅不以驕矜多欲，失慕容垂、姚萇之心，付兵二人，分道而來，持重而進，桓冲之憂豈為過哉？用兵者，恃我無可敗之道，不計夫敵之堅脆。今以游聲妓之宰相，溺浮屠酒色之君，與氐羌、鮮卑群雄為敵國，桓冲之

憂豈過哉？」（《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謝安十首〉其四，頁四三八四一）

陳普詠荀彧，稱曹操遭逢亂世，才長功大，遂為奸人，蓋緣於荀彧輔弼失職。假如荀彧（文若）輔君，能如諸葛亮輔佐先主劉備後主劉禪般，勉以道義賢良，則曹操為國家討賊立功封侯，所謂「暮年當作漢征西」也。⁵⁷此即自注所云：「使文若始見，即以道義輔之，以文若之才略，足使操征伐四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則以操之英決，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逆亂之心老死不發矣！」假設，指事實不然，將無作有，最便於揮灑推拓，創意造語。〈荀彧〉四首其四，將魏蜀君臣易位，進行假設翻案，謂英主如劉備，臣下關羽張飛卻「勇而不智」，未可相得益彰；梟雄如曹操，卻多如荀彧之智士。假設關張等有荀彧之才幹，那肯定「玄德翱翔早十年」，歷史豈不改寫？假設翻案，將虛作實，以無為有，由於落想天外，往往形成一個「嶄新世界，特定乾坤」，作一轉語，往往創意無限。又如〈謝安十首〉其四，謂淝水之戰（383），東晉贏來僥倖，苻堅驕矜多欲，無良自敗。否則，「以游聲妓之宰相（謝安），溺浮屠酒色之君（簡文帝），與氐羌、鮮卑群雄為敵國」，勝負可以不卜而知。桓沖之憂，不可謂杞憂，更不可視為失言，此就當時苻秦與東晉朝廷之實況論之。陳普於此詩之論斷，乃假設式翻案：如果「苻堅不以驕矜多欲」失去民心，則「到頭棋酒消磨晉」，將成為歷史之必然；桓沖之憂，將不為過；桓沖之諫，將不為失言。善用翻案，往往刻抉入裡，深折透闢有如此者。陳普詠史詩，運用翻案手法，往往有新奇、意外、層深、自得之妙，除上述之外，尚多有之，如：

茂陵無奈太倉陳，槐里家傳本助秦。萬落千村荆杞滿，隴西桃李亦成薪。
自注：「漢武疲四夷，凡為之驅馳者，皆助桀也。廣陵，衛霍所忌，而必欲求用，殺身亡家，則固其所。山西氣習，君子不道。太史公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贊之，亦非君子之言。廣，秦將李信之後，陵，廣子當戶遺腹子也。」（《全宋詩》卷三六五〇，陳普〈李廣陵二首〉其一，頁四三八〇一）

⁵⁷ 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建安十五年）

白頭上峽歷群蠻，展轉亡張又失關。取得益州竟何益？不如賣履看人間。
 自注：「老而後誇荆益，天也。早得十年，則可觀矣。備少孤貧，與母販履為業。」（《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蜀先主一十二首〉其二，頁四三八一八）

李廣「才氣無雙」，廣陵祖孫「數奇」不遇，陳普〈李廣李陵二首〉其一，感慨李廣李陵祖孫之際遇，弄巧成拙，諷諭獨深。運用翻案處有二：其一，參閱《史記》〈平準書〉、〈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漢武帝連年征戰，窮兵黷武，李氏子孫為將，為王馳驅，討伐匈奴，無異助桀為虐。陳普詩稱：「槐里家傳本助秦」，反常合道，絕妙諷刺。三四句承上戰爭殺伐，順敘荆杞滿村，蓋轉化《老子》第三十章：「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意。復次，再就〈李將軍列傳·太史公曰〉褒崇李廣作翻案，謂「隴西桃李亦成薪」，既呼應自注評判《史記》論贊所謂「非君子之言」，且以形象語解讀〈李將軍列傳〉，敘陵降族誅後：「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成敗毀譽瞬間升降如此，出以翻案，密度張力更足。〈蜀先主一十二首〉其二，遺憾劉備老年白頭始取益州，已錯失時機，無濟於事。此李商隱〈籌筆驛〉所謂「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詩意。據此推論：「取得益州竟何益？不如賣履看人間！」，劉備取得益州，其利益竟然不如賣履之利潤！運用翻案之滑稽突梯，反諷嘲弄，筆鋒辛辣，由此可見一斑。其他翻案之作，如：

卞莊已晚鬪於菟，堯論方規逐五胡。莫把亂華罪夷狄，鮮卑臣節過猗盧。
 自注：「江統所言，侍御史郭欽言於武帝之世矣，不能行。時劉淵在并州已強，齊萬年雖破，而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叛洛陽，氐楊茂披據仇池，當時行統言，則一呼而起矣。老莊奔淫之俗已成，賈庶人之焰已熾，諸王之相噬已有形，就如統策，盡逐諸戎，晉室能不亂哉？以慕容廆招拓拔氏、段氏觀之，夷狄之人皆吾人也。苻氏、姚氏、劉淵、慕容垂有以服其心，皆吾之蕭曹韓彭也。有道則守在四夷，不道則一卒足以亡秦，何必五胡能扛晉鼎哉？」（《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江統〉，頁四三八三八）

晉家事勢若崩河，忘却吳松好月波。莫把李膺誇二陸，思鱸羨鶴不曾多。
 自注：「元康之末，永寧、永康之間，衽席歌舞之中，無故而罹滅身赤族

之禍者，非一人一家矣。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罔又非可與共濟之人，顧榮、張翰遲留不去，欲何伺乎？禍迫而後拂衣，賢於陸機則可，方之韋忠、董養為已晚矣。」（《全宋詩》卷三六五一，陳普〈張翰〉，頁四三八三八）

〈江統〉詩，一二句使事用典，⁵⁸以文字為詩，消納書卷以為詩材。謂晉室諸王或自相殘殺，或坐觀成敗，可謂自作孽，不可活，實不必等待五胡亂華，已自亂自敗矣。縱然晉武帝採行江統之策略：「盡逐諸戎」，晉室亦不得不亂，故陳普批判江統之奏言為「蕘論」，自見褒貶。由此觀之，亂華者為晉室，不得推諉歸咎於夷狄，夷狄有道如鮮卑，其臣節往往有可取者。三四句出以翻案，翻轉歷史對於五胡亂華之蓋棺論定，有出奇、創新、意外，自得之妙。《世說新語·識鑒》載張翰因秋風思吳中莼鱸，遂命駕便歸，《晉書·張翰傳》亦云：「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張翰之見機、明智，知所進退，傳為千古佳話。然陳普《詠史》〈張翰〉一詩，卻故作翻案，以李膺借指張翰，認為「莫把李膺誇二陸，思鱸羨鶴不曾多」。翻案詩，推翻成說定論，別出心裁，必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方能服口服心。陳普自注提出論證：「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罔又非可與共濟之人，顧榮張翰遲留不去，欲何伺乎？禍迫而後拂衣，賢於陸機則可，方之韋忠、董養為已晚矣！」以「不曾多」作轉語，翻駁《世說》、《晉史》所謂見機、明智之說，持之有故，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據此推想，陳普創作《詠史》組詩，既以「鑑戒六朝」為重點，則《晉書》、《南北史》、《三國志》、《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圖書典籍必先經眼詳讀，而且慎思明辨，方能纂組史料，羅列翔實之自注，進而提煉出卓識偉論，以之作詠史之翻案依據。自北宋國子監雕印《十七史》，及《資治通鑑》，「皆下杭州鏤版」，傳播天下。就陳普之地緣關係言，建陽刊刻之史籍，如就《史記》刻本而言，有紹興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宅刻裴注《史記集解》130卷、南宋初建陽書坊《史記集解》、乾道七年（1171）建陽蔡夢弼《史記集解索隱》130卷，為「南宋版建本之精者」。慶元間（1195-1200）建陽黃善夫刊刻《史記》正文，與三家注四合一刻本，號稱「建本最精者」。又《西漢會要》70卷，嘉定八年（1215）刊於建寧府；《東漢會要》40卷，刊於寶慶二年（1226）建寧郡齋。百衲本《資治通鑑》，蒐集

⁵⁸ 《史記·張儀列傳》：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鬥，鬥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

建本最多；可以推想福建刻本之繁榮。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最早刊行於泉州郡齋，時為嘉定十二年（1219年）。⁵⁹這些攸關六朝之史籍刊行，提供閱讀接受許多便利。加上福建藏書樓之庋藏，雕版印刷繁榮，圖書流通便捷、印本文化當令，多助長詠史組詩之發達。陳普生當宋末元初，地處刻書發達，藏書豐富之閩南，故其詠史詩呈現若是之風貌。印本文化影響詠史詩，甚至翻案手法，一則可以擺脫蹈襲剽竊，再則可以療治熟腐淺滑，三則可以遠離濫調近境，無俗態凡響；四則可以解黏去縛，避免著實執死；⁶⁰此與詠史詩標榜史識超拔，「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目標理想一致，故宋人詠史運用翻案獨多。陳普《詠史》之翻案，特其顯例而已。

筆者以為：翻案法之大行其道，是「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困境下，宋人企圖「翻出如來掌心」⁶¹的權變和轉機。大凡上乘的翻案之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往足以跟巨人比肩；是一種用鑽石切割鑽石，以創意挑戰卓越的策略和方法。所謂翻案，是以原案為基座，為墊腳、為跳板，進行翻轉變異、推陳出新、別出心裁之設計，或刻抉入裡，或反常合道，或推倒扶起，或死蛇活弄，往往能妙脫蹊徑，展現新奇，在在都以原案作參照觸媒，進行生發變通。黃宗羲所謂「讀書不多，不能證斯語之變化」；所謂「踢倒當場傀儡，闢開另地乾坤」，差堪比擬翻案之效用。語云：「胸有詩書氣自華」，知識與學問二者，是詩人運用翻案的憑藉，雕版印刷提供士人購求印本之便利，圖書流通迅速、藏本借閱容易，多有助於翻案法之運用。何況，詩人面對大家名家作品，翻案法為「盛極難繼」、「處窮必變」的宋人，提供絕佳之轉機與契機，驗諸陳普詠史詩及其他宋人名篇佳作，要皆如此。

四、結論

陳普生當宋末元初，印本圖書流通已取代寫本鈔本；又地處福建閩北，刻書業林立，藏書家眾多；且受朱熹「道問學而尊德性」、格物致知之教影響，尙知識、

⁵⁹ 同註 26，〈建本《史記》之最〉，〈百衲本《資治通鑑》〉，《兩漢會要》的最早刻本，頁 19-26。

⁶⁰ 同注 53，頁 114。

⁶¹ 「一切好詩」云云，語見魯迅：〈致楊霽雲〉，《魯迅全集》第 12 卷，〈書信〉，193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頁 612。

重學問。時、空、閩學與書林人物因緣際會，讀書與博學主張蔚然成風，以之寫作詠史詩，為追求「在古人不到處，別生眼目」，勢必如《滄浪詩話·詩辨》所云：「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西諺有云：「印刷術為文明之母」，印本文化流衍對文學創作與評論，究竟生發如何之影響？為筆者新近關注之系列課題。詠史詩與讀書詩當有較具體之反應，本文特其中之一。

本文討論陳普詠史詩，受圖書傳播、印本文化影響激盪，在注重讀書博學的氛圍中，體制、語言、風格、技法方面所生發之轉折。暫分詩篇自注、資書以為詩、翻案生新、連章逞巧四端論證之，結論已分見上述各項之煞尾中，茲不再贅。蓋印本崛起，與寫本爭輝，圖書傳播便捷，知識信息量豐沛而多元，勢必引發閱讀、接受、積學、發表之變革。蘇軾〈稼說送張琥〉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可借喻指稱從閱讀到發表之策略與效應。李約瑟等西方學者指出：活字印刷術在歐洲的傳播，促成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因為，中國西傳的印刷術，使教育平民化了。試以此對照雕版印刷在宋代之流傳，其影響詩壇、文壇及學術界，其效應是否可以類推？抑或不能相提並論？此一課題，值得關注。

陳普身處閩學會粹、書院林立、刻書繁榮、藏書豐富之福建地區，時逢寫本與印本爭輝，印本逐漸取代寫本之晚宋，講學宗法朱熹「問學致知」一派，以此而寫作詠史詩，可以看出晚宋詠史詩之嬗變與轉折來。本文推想寫本、藏本等圖書流通，以及雕版印刷對陳普《詠史》組詩生發的可能影響。其他，尚有屬於內容思想、史學史識者，擬分六大層面闡釋解讀：

- (一) 鑑戒六朝：陳普《詠史》組詩自李膺范滂郭林宗，至梁武帝高歡侯景，共180首詩，多詠六朝之王侯將相、士人儒生，數量佔總量七分之五以上，考察其成敗興廢，探究其進退出處，可作為身處亂世安身立命之龜鑑。
- (二) 會通史論：以自注體式，發揮其歷史評論，大抵纂組相關史事，排比相異或相通之觀點，會通化成衍為詩文。於是自注之史論與詠史詩同題共作，明暗相生，虛實相成，會通詩文，相得益彰。筆者以為：此乃宋型文化之體現，若非印本圖書購求容易，將無緣閱讀豐富之歷史文獻，勢不能成此史論。
- (三) 史識獨到：「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為南宋詠史詩追求之特色；歷史文獻爛熟默識在先，方能不為不襲；知前人未嘗道處，方能「爭出新意，各相雄長」。陳普《詠史》組詩尚論古人，出於別識創意者不少，頗可寶貴。

詠史追求別識創意，影響所及，褒貶人物，進退公卿，軒輊史事，亦往往逞巧出奇，恥與人同。所謂獨創成就，不隨人後，陳普《詠史》之褒美貶惡有之。

- (四)《春秋》書法：北宋歐陽脩以來所倡「正統」論，《公羊》學所謂「大一統」，胡安國《春秋傳》借古喻今之資鑑，⁶²《春秋》書法所謂「誅心」之論，陳普《詠史》組詩中多所體現。
- (五)經世資鑑：史學所以經世，不在空言著述，陳普《詠史》組詩於詠王昭君、漢光武、楊太后、杜預、周處、魏徵、房玄齡處，多特提強調之。既有助於解讀歷史，與北宋以來史論文相較，頗有相互發明之價值。⁶³
- (六)朱學流衍與以理學為詩：陳普於《宋元學案》列入潛庵（輔廣）學案，屬朱子理學一系。今考《詠史》組詩及自注所云，或倡道德事功，或示正誼明道，或強調天理綱常，或關注心術本領，或標榜格物致知，顯然是「以理學入詩」。宋詩創作之致力「出位」，陳普《詠史》組詩可見。

限於篇幅字數，上述六個子題，本文未及考察探論，姑記於此。擬別撰一長文，他日再暢談一得之愚。

⁶²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八章第三節，一、胡安國：更自覺的借古喻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221-223。

⁶³ 韓流：《潤泉日記》卷下稱：「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又云：「古人之史，非是備遺忘，要務多，以美觀也。因今勸後，因後明前，經制述作二者是大。」南宋重事功與經世之學，浙東學派為代表，參考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第八章第五節〈事功之學與經世之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頁250-255。

引用文獻

一、古籍原典

- 《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 《梁谿漫志》，宋·費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纂，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8月。
-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5冊，臺北：商務印書館。
- 《宋詩話輯佚》，郭紹虞校輯，1937年8月，哈佛燕京學社出版，臺北：文泉閣出版社影印，1972年。
- 《石堂先生遺集》，宋·陳普撰，明閔文振編，國家圖書館藏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一。
- 《全宋詩》(1-72)，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
-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撰，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8月。
- 《畫禪室隨筆》，明·董其昌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 《閩南道學源流》，明·楊應詔撰，明嘉靖四十三年刊本。
-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撰，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9月。
- 《史記志疑》，清·梁玉繩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6月。
- 《閩中理學淵源考》，清·李清馥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 《宋元學案》，清·黃宗羲、全祖望撰，臺北：河洛出版社。
- 《藏書紀事詩》卷一，王鏊點校本，清·葉昌熾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
- 《讀杜札記》，清·郭曾炘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
- 《石遺室詩話》，陳衍撰，《民國詩話叢編》本，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12月。
- 《魯迅全集》，魯迅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二、近人專著

-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唐集敘錄》，萬曼撰，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

- 《中國目錄學史》，王重民撰，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李約瑟撰，范庭育譯，臺北：帕米爾書店，1987年3月。
-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胡繩主編，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10月。
-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葉嘉瑩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 《談藝錄》，錢鍾書撰，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
- 《魏晉玄學史》，許抗生等，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7月。
- 《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張高評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3月。
-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羅宗強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 《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鏗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月。
- 《春秋左傳學史稿》，沈玉成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 《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日本尾崎康撰，陳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7月。
-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曹之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
- 《中國圖書論集》，程煥文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8月。
-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張高評撰，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
- 《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等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 《宋金元文學批評史》，顧易生、蔣凡、劉明今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 《中國史學思想史》，吳懷祺撰，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 《兩宋文化史研究》，楊渭生等撰，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宿白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
- 《南宋史稿》，何忠禮、徐吉軍撰，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
- 《藏書與文化》，周少川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
- 《鍾嶸詩品研究》，張伯偉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
- 《宋人別集敘錄》，祝尙書撰，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
- 《朱熹文學研究》，莫礪鋒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 《宋元版刻圖釋》，陳堅、馬文大撰，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 《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錢存訓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2月。

- 《佛經版本》，李際華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福建古書之最》，方彥壽。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4月。
- 《清水茂漢學論集》，清水茂撰，蔡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0月。
- 《建陽刻書史》，方彥壽，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1月。
- 《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
- 《宋人總集敘錄》，祝尙書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月。
- 《中國歷代藏書史》，徐凌志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張高評撰，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
- 《觀眾心理學》，余秋雨撰，臺北：天下文化，2006年1月。
- 《中國印刷史》，張秀民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三、期刊論文

- 〈宋代史學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高國杭撰，《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4集，1983年。
- 〈試論杜甫七律組詩的連章法〉，馬承五撰，《草堂》1985年2期。
- 〈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張希清，《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
- 〈中國歷代書價考〉，袁逸撰，《編輯之友》1993年2期。
- 〈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張希清撰，《國學研究》第二卷，1994年7月。
- 〈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張高評撰，《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6月。
- 〈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張高評撰，《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4年3月。
- 〈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張高評撰，《漢學研究》24卷2期，2006年12月。
- 〈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唐——博觀約取與宋刊唐詩選集〉，張高評撰，《成大中文學報》第十六期，2007年4月。
- 〈創造思維與宋詩特色——以創造性模仿、求異思維為例〉，張高評撰，《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7年6月。
- 〈宋代私家藏書概略〉，袁同禮撰，《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2期。

Printing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onal historical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Using Chen Pu's(陳普)Suite of Intonal Historical Poems in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as Examples

Chang, Kao-Ping*

[Abstract]

It is easy to purchase the printed-book because of the rise of the engraving printing technique. Accelerating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it must agitate and response as to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ography, philosophy of some others. Song Poetry have a style of Song 's own in transformation of Tang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printed-book and the codices, provided abundant information of books, influenced the reading acceptance. Formulation with the features of Song poems, the flourishing of the printed-book transferred the difference of Song poetry with Tang poetry. This thesis selects the poems of intonal history a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emonstration. Because their course of the creation were influenced by the books reading and the edition spreads. Era fixed on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then the printed-book had replaced the codices. We choose Chen Pu, Neo-Confucian, as example. Pay attention to its luxuriance of School of Fujian, the academy standing, prosperity of engraving book, enriching of collecting book in Fujian. He lectured on "Ge Wu Zhi Zhi"(格物致知)in Zhu Xi ' studies system. We investigate their " Intonal history " 362 suite of poems with background as the text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ing. Dividing four respects explain : one's own explanatory note of poems, poems inspired by books, reverse a verdict to grow newly, skillful purpose of linking poems. Thus it can see the woodblock printing influence poem systems, language, skill, style. Literature research can combine the edition studying, bibliography, documents studying. This thesis regards as a beginning.

Keywords: The Printed-book Culture, Chen Pu(陳普), Intonal History, Suite of Poems, Song Poems Features

